本报记者 赵 雪
视觉设计 许 科

机要员

入朝时间
1950年10月

所用工具
电台
密码本

提示

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不仅有战斗在前线英勇杀敌的志愿军战士，还有许多做着特殊工作的“幕后英雄”，比如翻译、机要员、阵地观察员、战地汇款员等。他们中有许多人或许并没有直接面对敌人，但他们却是这场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力量。

山高林密处搭建工作场地

走近战场上的『幕后英雄』

随身携带密码本

辽宁省档案馆原馆长孙景悦已年逾九旬，作为当年赴朝参战志愿军战士中的一员，留在他记忆中的战斗场面并不多。当年的他，是一名机要员。孙景悦告诉记者，他现在能记住的，更多的是幽深的山洞、朝鲜老乡的房子，还有发报机永不停歇的嘀嘀声……

孙景悦是东北机要干部学校第三期学员。1948年春，孙景悦成了东北野战军机要处的一名机要员。

“1950年7月下旬，我和四野机要处的几名同志奉调随军北上，在沈阳组成了东北边防军机要科。”孙景悦说，10月中旬，到达安东（今丹东）后，他和另两名同志就被调到新组建的志愿军后勤一分部，与其他人员一起转往通化待命。

“接到赴朝命令时我们还在通化山区，刚刚接收了从东北军区机要干部学校毕业的8名同志及几名通信员，共同组建了后勤一分部机要科，我担任译电组组长。”孙景悦说。

接到命令后，孙景悦换上了服装，带上密码本，随入朝大部队赶赴集安准备渡江，“我们是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渡过鸭绿江的，第二天早上到达朝鲜江界。”当满目疮痍的朝鲜土地出现在孙景悦眼前时，他被刺痛了，“我当时就有一种使命感，一定要把敌人从这里赶出去！”

部队的机要工作主要以通信、情报收集为主，机要科的安全十分重要。

“在朝鲜战场，因为工作的特殊性，领导总是把机要科驻地安排在身边。住山洞时，首长们在外层办公，我们就在洞里深处工作，住民房时我们也被安排到距离较近且易于隐蔽的地方。”孙景悦说，当时敌机常低空飞行，发现目标就轰炸扫射，“后来次数多了，我们一听声音就能分辨出来敌机是来轰炸的还是只路过。”

孙景悦和同志们还给敌机分别起了名字：“我们当时最痛恨的就是两种美军战斗机，一种叫‘黑寡妇’，另一种叫‘油挑子’。”

那时，孙景悦常常随身携带着一个密码本，上面写满了数字，每组数字都代表一个汉字。“上面大概有1万多个汉字，我大概都能记住，工作时基本不用翻本子。不过为了安全，我们的密码也是需要常常更换的。”孙景悦说。

第三次战役打响之后，机要科的工作变得更忙碌了。当时部队越过了三八线，运输供应线变长，各方面的来往电报一下子变多了。前线各军要求物资供给的急电，志司(志愿军司令部)、志后(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)关于粮食、弹药、被服等调拨的催运令，分部关于各类物资运送情况的报告，以及对各兵站、汽车团、野战医院和工兵、防空兵、民工担架工作部署情况等大量往来电报，都要求孙景悦这些机要员随到随译，保证译发电文及时送出。

昼夜不停译发电文

对孙景悦来说，第四次战役期间是他最累也最心酸的一段时间。

回首那段经历，他还会痛心地告诉记者：“当时38军、39军、50军都打到了汉城以南，后勤补给跟不上。第38军当时从汉江南岸连发急电报告，因为缺少粮食和弹药，战士们都在用刺刀和石头与敌人拼杀，不少战士甚至饿晕在阵地上。”

前线战情通告、物资分配、紧急运送任务电令等各类加急、特急电报日夜不断，机要处需要昼夜不停地译发电文，送阅首长或交电台发出。

当时因为电台都是手摇马达发动，受功率、距离、地形和敌机干扰等影响，所收电码往往错误较多，增加了译电的难度。

孙景悦告诉记者，“我所在的科译电员都是新手，参加工作不久，业务不够熟练。作为译电组组长，我除了必须参加急电译发工作，还要负责对每份译出的电文进行校对改错，以确保其准确无误。”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，他和机要处的同志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，“困了就在译电桌上睡，最多一次连续六七天都没睡多少觉。”

山洞里待了两个多月

三登石门里矿洞从洞口到深处有近百米，孙景悦所在的机要科在矿洞的最深处。

回忆起那时的工作，孙景悦这样向记者描述：“我们用树干和雨布搭起工作场地，下有流水上有滴水，大家工作、吃饭、睡觉都在里面，分不出白天黑夜。脸被烛烟熏黑了也顾不上洗，身上长虱子也顾不得挠，大家很少去洞口见见阳光、呼吸新鲜空气。”

由山洞迁出转住民房后，机要科工作人员也都是白天进到山高林密沟深的隐蔽处，用树枝搭棚子、用炮弹箱当桌子工作，晚上回到屋里，还要把门窗挡严以防烛光外露。

“十多个人挤在一铺炕上，轮换着工作和睡觉。”孙景悦说，他们经常在桌子旁刚睡一会，就被唤起处理工作。

1952年初，孙景悦因疲劳过度病倒了，被送到江东以南志愿军笏洞干休所医治。治疗一个多月后，被诊断为肺结核，他被送回北京治病。在朝鲜战场战斗了近3年的时间后，孙景悦回到了祖国。

“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70年，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忘记那段历史，它不仅让我们铭记一种精神，而且让我们更深地懂得，只有我们自己变得强大了，才不会吃亏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更努力地工作，让祖国变得更强大，才不辜负在战场上牺牲的那些英烈！”孙景悦说。

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有很多特殊的兵种并不为我们所熟悉，但他们的贡献同样不可忽略。孙景悦对记者说，在他的身边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志愿军战士，虽然没有战斗在第一线，但他们也是一群舍生忘死的战士，也一样应该被铭记在史册。采访中，几位老人数度哽咽，70年过去了，他们仍然记得战场上发生的一切。而对于我们来说，将这些珍贵的记忆逐一记录下来，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

朝鲜战场上那些特殊的“兵”

观察员黄玉普：练就“火眼金睛”

92岁的黄玉普最珍惜的是在战场上获得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奖章。

这位曾参加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告诉记者，对他来说，这些荣誉和生命一样宝贵，因为它们真切地记录着那段难以忘怀的峥嵘岁月！

1950年10月，刚刚参加完解放云南省战役，黄玉普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，“我当时是在38军114师341团团部指挥所担任阵地观察员。”黄玉普说，当时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侦察敌军的坦克和汽车动向。

阵地观察员不仅要眼神好，而且要反应机敏，能够随机应变。

有一次，天刚亮，正在潜伏观察的黄玉普忽然发现有20多辆敌军坦克正向阵地开来，“我马上向领导汇报了情况。”黄玉普说，自己当时拿着望远镜看见战友英勇战斗，击退敌人最终保住阵地，心里激动万分。

在14个月的时间里，黄玉普身背6公斤重的无线电话机，不怕危险，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侦察。部队根据他提供的情报，及时作出战斗部署，打了许多大胜仗。

因为勇敢机智，时任38军114师师长的宋文洪十分器重黄玉普，“有一次，宋师长让我找连长研究作战计划，当时下着大雪，师长就把战靴脱下来让我穿。他还教我如何跟敌人拼刺刀。”黄玉普回忆道。

在第四次战役中，黄玉普所在部队遭遇敌人轰炸，“我们全连最后只剩下我和另一个战友两个人，我被埋在土里，被救出来后留下头疼的后遗症。”黄玉普说，现在他一年四季都得戴着帽子，不然就会头疼。

“在朝鲜作战，我们经常要长途行军，山谷里都没有路，我们就用脚蹚出路来。天下大雨，路很滑，一不小心就会掉到山涧里。”黄玉普说，很多战友就是这样牺牲的。

“过江时穿着棉衣，上岸后把衣服拧一拧又得穿上。”他说，有一次，在战斗中他的右胳膊受伤感染，差点截肢，最后找到村里一位老奶奶治疗后才好起来。

为了躲避敌人轰炸，黄玉普和战友们时常要在积水的山洞里过夜，没吃没喝也是经常事，他说：“渴了吃口雪，饿了就吃草根，没吃的就饿着。”就这样，黄玉普在朝鲜战场一直战斗到1953年。

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黄玉普当时所在团选出5位立过功的代表，参加中央代表慰问团慰问志愿军活动，黄玉普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回忆说：“我记得当时去了沈阳工人俱乐部，还看了梅兰芳老师表演的京剧，特别开心。”

70年过去了，黄玉普总会想起当年牺牲的那些战友，他说：“我为他们感到光荣，我希望人们能够珍惜现在的生活，不要忘记当年战场上牺牲的那些英烈。”

陆空联络员张云江：背红色布板

在朝鲜战场浩浩荡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队伍中，人们总会发现一些背着红色布板的战士穿插在其中。他们就是志愿军战士口中常说的“陆空联络员”，张云江是其中一员。

张云江出生于1932年，曾是50军150师450团的一名步兵。1950年10月，张云江随部队秘密过江奔赴朝鲜，“我们当时的这个陆空联络班一共有6个人，我是班长。”每名陆空联络员身上都背着一个红色的布板，他们的工作就是用布板摆出各种“符号”和飞行员沟通，指挥行动。

张云江回忆说，当时部队刚过江进入朝鲜，还没到45公里就遭遇了敌人，“敌人的装备比我们精良，我们当时被告知不能轻易对战，要绕小路到敌人身后，进行突袭。”张云江告诉记者，每次打完仗，很多战士都背着两三杆枪，“是缴获敌人的，但大多是打完枪里剩下的子弹就把枪扔了，那些枪的子弹和咱们的不一样。”

词条

探照灯兵部队

我军第一个探照灯团 **121**团 **1950**年组建

1951年 又先后组建 **5**个探照灯团

从1951年12月起先后有 **1**个团 **5**个营 **2**个连赴朝参战

第一批入朝作战的探照灯第101团1营、2营
在5个多月的作战过程中先后配合空军、高射炮兵

击落敌机 **9**架 / 击伤 **12**架